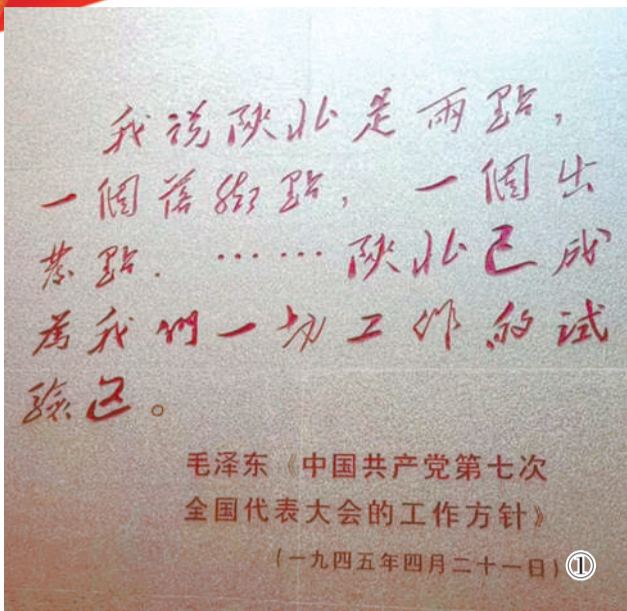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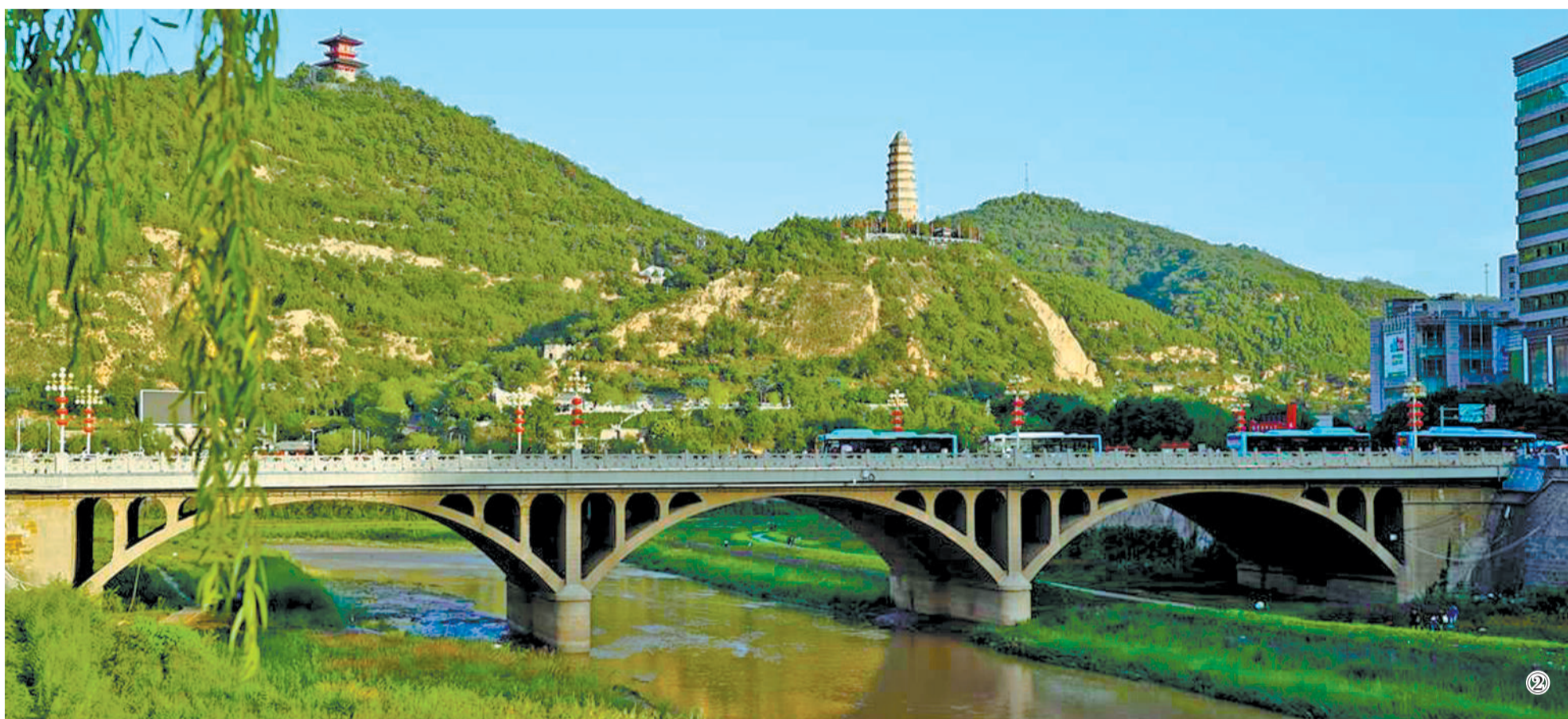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革命圣地照亮神州

本报记者 张毅



我说陕北是两路，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

吴起镇——并非偶然的“落脚点”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小册子在英国伦敦出版。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主力陆续进驻吴起镇。吴起县党史专家马广干介绍，党中央在这里的13天里，开了7次会，打了4次仗。

马广干说，虽然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并非事先安排好的，但认真研究就会发现，这却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瓦窑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源地”

走进延安市子长市，车水马龙的商贸气息扑面而来。很少有人知道，早在80多年前，这里就曾经诞生过陕北苏区的第一个“市”——瓦窑堡市。

“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当毛泽东在瓦窑堡作出这一预判时，波澜壮阔的“新局面”已然在这个深藏于陕北大山褶皱里的小镇上策动了。

在不足12平方米的窑洞里，一面土炕几乎占去三分之一的空间；两张八仙桌拼起来的会议桌旁围着六条长凳。

是对“严肃、激烈、真诚”的会议气氛有感而发。

强大、高效的执行力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迅速走向壮大的又一利器。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白区工作委员会，主攻围困陕北的国民党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延河宝塔——中流砥柱 圣地热土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穿行在鳞次栉比的延安革命旧址之间，诗人贺敬之那首魂牵梦萦之作将记者的思绪带到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

据袁武振介绍，从1938年至1945年八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逐年分别是：59%、62%、58%、75%、63%、58%、64%、69%。

在边区政府旧址，窑洞里的历史遗迹、老照片和数据图表为后人勾勒出一个遥远而清晰的抗日民主政权形态，“三三制”制度创新、先后三次的三级边区民主选举以及工会、青年救国会、妇联、战地服务团、抗敌互济会等抗日根据地民主改革和大量群众性团体的集中涌现。

边区政府旧址窑洞里，一张“陕甘宁边区生产发展统计表”吸引了记者的目光：1938年至1945年，边区耕地增加1.44倍、粮食产量增加1.32倍、牛羊驴等存栏增幅均在2.5倍以上。

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党中央的回答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距宝塔山40多公里的南泥湾，如今是延安市南泥湾开发区。依托丰厚的红色文旅和现代农业资源，这里已成为陕甘宁区域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杨家岭——党建工程的重大“坐标”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门前一侧，镌刻着党的一大至六大简况的六方巨石由远及近，直抵门前。

1945年4月23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场陈设特别是主席台上方高悬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横幅，记者似乎听到755名党代表纷沓而来的脚步声。



图① 在党的七大旧址，墙上镌刻着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的一句话。

图② 山青水碧的宝塔山延河水。

图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

回望来路 砥砺初心

张毅

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著名作家柳青曾说，人生的路很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回望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恰如人生之路的关键“几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卓越的政治判断力和排除万难的执行力，于艰难困苦之中奋勇担当，在领导全国军民夺取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伟大实践中，完成了一个百年大党从步履蹒跚向步履稳健的精彩转身。

“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曾反复说过这句话。这句话不仅为记者厘清了采访逻辑，也引发记者与诸多党史专家深入讨论和思考。

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理想信念是旗帜是灯塔，但关键时刻，举旗人、擎灯者更加不可或缺。

有一套科学的理论指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终探索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邓小平曾指出，在抗日战争这场以劣胜优的战争中，我们成功的主要秘诀，是因为“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具体表现就是，科学审视、巧妙造势、相机夺势。

有一颗“人民至上”的初心。延安时期，革命大业反败为胜由弱变强，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了“最广大”的支持。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和事业兴衰的决定性因素。